

# 现代性危机与生态文明的兴起

赵建军 赵若玺

**摘要** 现代性作为一种将人类从非理性及蒙昧状态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人类历史，它在充分肯定释放人类潜能的同时，也造成多种危机的凸显，生态危机、人的危机、社会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典型特征。现代性工业文明价值观下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虽然被标识为一种强有力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却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当前人们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和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为化解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有益的价值遵循及实现路径。

**关键词** 现代性危机 思维方式 主客二分 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 - 851X (2022) 03 - 0021 - 10

Modern（现代）及其派生词源自英语单词 modus（尺度）。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最早于公元5世纪出现，内涵上强调的是古今之间的断裂，意欲将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现代社会和仍然属于异教的罗马社会区别开来”（尤尔根·哈贝马斯，2002）。然而，用来指称现时代的英语单词 modern 最早出现在1585年，modernity（现代性）则到1627年才被使用，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以与古代相对立的意义被理解的。“现代”这一观念及后来所谓的现代性，是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以来欧洲思想所特有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与此前的用法截然不同，它非常注重与先前事物的区别，因为其所依据的是自由和进步的革命观念（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2012）。

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应当超越具体的时间概念界限，因为它的内涵向来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而进入历史的，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追求，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产力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发展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研究”（批准号：21AZD05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建军，南开大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91，电子邮箱：adad390@163.com；赵若玺，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助理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35，电子邮箱：445764625@qq.com。

致谢：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当然文责自负。

和最丰富的物质财富，给人类带来了不同以往的新天地。

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指出：“韦伯所认为的社会现代化就是目的理性行为的制度化，而且首先反映在国家和经济这两个富有活力的核心部门当中。如果不诉诸总体化的理性活动，我们根本就无法克服社会的解体并过渡到一个不太零散而且更加稳定的社会”。韦伯对现代性的阐释开创了对现代性的主流理解，他将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加以社会学的分析和改造，提出了“合理性”和“理性化”等概念。在韦伯看来，现代性的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就在于其理性化程度。韦伯认为，现代性既然从启蒙运动走来，必然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密切相关，理性主义在批判蒙昧主义、宗教神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精神来源。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现代性特征就是理性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耦合所产生的理性化的行为和结果。

因此，本文认为现代性就是通过理念、政治、经济、科技、制度、组织等一系列变革，推动传统社会不断高度理性化的一个过程，现代性的合理性就意味着理性认知的潜能转化为科技发展、经济行为和行政管理系统的合理性，现代性文化也建立在科技知识、经济发展优先于其他文化的基础之上。置身于现代性视角下的文明进步就体现为科技的不断发展、经济的持续增长、行政系统的有效完善等。

现代性的进程一方面以对人类文明美好前景为期许，创造了无数辉煌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性成就的取得也伴随着一系列困境和危机。正如吉登斯对现代性双重特性的阐释“现代性是一种双重现象，同任何一种前现代体系相比较，现代社会制度的发展以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享受安全和有成就的生活机会。但是现代性也有其阴暗面，在本世纪尤为明显”（安东尼·吉登斯，2000）。当然，我们从整体上肯定和认同现代性的积极意义，但现代性发展困境和危机也是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发展而不可避免发生的历史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现代性价值体系对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价值的背离。

## 一、现代性危机的三大表现

现代性是在对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产物的继承基础之上展开的，充分彰显了西方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各种历史成就。当人类经历了漫长的自然力量及外界权威的奴役和统治后，便极力想在现代性进程中重新发现和确认人的尊严、倡导人的价值，并肯定其主体性地位。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主体性的彰显和对自由的普遍追求，“主体性及其相关的理性、自由、合理性等概念无疑构成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陈嘉明，2006）。现代性视域下人类的行为方式不再是屈从于外界的权威，而是立足于自身主体活动的自由支配。但现代性在充分发现和肯定人的价值的同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社会发展的全面危机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无家可归”。因此，伴随着现代性画卷的徐徐展开，现代性危机逐渐以三种形式呈

现出来，即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

### （一）生态危机的系统呈现

现代性的生态危机，即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是指由于人类不当行为所引起的环境恶化、生态系统严重失衡等现象。现代性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大量废弃物排放所造成的环境极度恶化所引起的。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取得短暂胜利后是自然对人的疯狂报复。可以说，生态危机是现代性危机的典型特征。

虽然生态问题自人类诞生时就已出现，但人类早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的干预程度远未达到自然承载的极限，因此人类也未进入“危机”的困境。人类的创造潜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曾受到压抑和阻碍，然而，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对自然从早期的轻微干预逐渐演变为控制和征服，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人与自然关系的逐渐疏离愈加凸显。

在现代性进程中，人类似乎摆脱了外在自然的一切束缚（无论是现实的还是观念的），获得了全面的解放。现代人揭示世界的本质，使自然最深处的奥秘得以展现，进而用理性、科学和知识取代了神话、迷信与幻想，以张扬和塑造理性为基础建立的世界也充分彰显出人的尊严和价值，于是人取代了上帝成为世界的主人。现代性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使得人类从外在世界的卑微处境中彻底解放出来，人类在充分确认自身主体性地位的同时，对自然的支配意识也随之产生。人们日益相信，凭借自身的主体性力量可以建构普遍统一的真理体系，并由此开始了对自然的祛魅。与此同时，在倡导人的解放、人的价值并肯定世俗生活的意义时，人们把欲望的满足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和目的，于是加剧了对自然的无限掠夺和利用，从而推动自然资源更为高效地转化成能够满足人们无限需求的产品。

人类文明的发展日新月异，物质财富的积累与日俱增，控制自然的能力获得了空前提高，“我们的行动将决定海平面的高低，可以改变降雨的过程和每一滴雨水的目的地，这至少就是自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胜利——对于地球的统治权”（比尔·麦克基本，2000）。这种统治权的取得是以对自然的毁灭为前提的，可以说，现代性的进程本身蕴含着反生态的本质特征，即一方面人类以自身解放的名义支配和控制自然，另一方面在充分肯定自我价值的同时促使欲望的膨胀与合理化，进而不断地加剧与自然的冲突和对立。

现代性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生存困境，而造成这一困境的正是人类自己，这一危机的产生是人类决策和工业胜利造成的结果，是出于发展和控制文明社会的需求。所以，工业文明所谓的“发展”和“文明”是建立在对自然无限度征服和控制基础之上的，其价值取向即是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对效率效益的无限尊崇，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范式。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摆脱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 （二）社会危机的全面凸显

现代性的社会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精神失落所带来的“意义迷失”。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强大的精神来源，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一种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另一种则是现代的或者“理性的”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传统资本主义没有将对于赢利的关心视为一种社会伦理，而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相对的“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则有其特定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对现代性社会精神气质和社会行为方式的塑造产生了重要作用。韦伯分析了这种精神形成的社会文化基础——新教伦理，并阐明了它同资本主义精神合理性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现代性社会的主要特征即是资本主义精神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耦合而生成的行为结果。

资本主义精神是催生现代性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动力，它源自新教伦理“天职观”的精神信念，在这种精神信念的召唤下，整个尘世都须以增进上帝荣耀而存在。可以说，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确是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创造了巨大的历史奇迹。但随着现代性物质财富的飞速增长，以及社会世俗化、理性化进程的加快，这种来自上帝的感召力似乎减弱了，现代性世俗化的影响逐渐渗透至社会的方方面面。丹尼尔·贝尔就曾指出，“资本主义早期，新教伦理等清教的约束遏制了经济行为的冲动及人们的任意行事，也曾被用来规定节俭的积累。但资本主义自身逐渐破坏了新教伦理，当新教伦理被资产阶级抛弃，剩下的便是享乐主义了”（丹尼尔·贝尔，1989）。所以说，“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构造，以及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丹尼尔·贝尔，1989）。而造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即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因为“现代社会是一种靠技术支撑和革命催生，通过历史（进步、理性和科学）来实现的世俗理想。信仰问题是它的真正问题，这是一种精神危机，在其稳定性下充满了各种虚幻，那么人要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丹尼尔·贝尔，1989）因此，表面繁华的现代性进程之下，却是一个沉浸于物质享受而没有“终极意义”所依托的精神失落的社会，渗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于是各种生存与发展问题便接踵而至。

作为一种新的文明范式，生态文明的提出或许为我们摆脱现代性社会危机提供了实践路径。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建，应当基于新的价值观念，它在深入挖掘人类智慧资源基础上追求合理性的发展方式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它不仅带来物质的富足，也是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全面更新，正如美国学者阿尔文·托夫勒用“第三次浪潮”来表达对工业文明后的新文明形态畅想时强调的那样，在道德、美学、政治和环境等日趋堕落的社会，无论它多么技术高超和富有，都不能被认为是进步的。进步不能再仅以物质生活和技术水平来衡量。社会也不是单一轨道发展的社会，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的标准。

## （三）人的危机的不断加剧

现代性人的危机体现在现实中的“幸福享受”和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物质丰

富和精神贫乏的对立已成为现代人不可摆脱的终极命运。现代性继承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丰富遗产，当理性启蒙战胜宗教权威、科学之光照亮迷信蒙昧，“上帝死了”之后，人们不知不觉走向了其继承人的角色，愈发地肯定自身是世界最为高贵的存在，认为凭借自身主体的力量，就能够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创造理想化的社会，甚至决定历史的走向。

人类在现代性进程中将人的解放和自身力量的彰显提升至极端，在充分肯定个人对世俗生活享有权利时忽视了对精神意义的追问。当人类沉浸在对现世“凡人的幸福”的追求中，当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等成为现代性社会的有力标识后，人的精神信仰必定浅薄化，于是现代人失去了精神上的根基而变得虚浮狂妄。现代性社会中人类一切实践活动的目标和追求不再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或者激发对彼岸世界的渴求，而是愈加转向对此岸生活追求的肯定。毫无疑问，这种价值追求彰显了现代性以来征服自然与改造社会的理想，实现了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激发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但与此同时，现实主义与物质主义的泛滥会使人们普遍感受到精神上的失落与彷徨，从根本上，这种迷失反映了现代性对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价值的背离。可以说，现代性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渗透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和矛盾，一方面人类沉浸在征服自然胜利的快感中，但对其自身的存在意义、行为的终极目的茫然无知，另一方面却高扬现代性精神的至高无上，而其在领会自身精神世界和普遍意义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不得不说，这是人类自身危机的一种现代性表现。

作为针对现代工业文明价值观突出性弊端而提出的生态文明，它所树立的价值观将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物质富足与精神丰富的合理关系，使物欲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实现平衡，从而促进人全面健康的发展，进而摆脱“人的危机”。从价值观念来看，生态文明的提出就是要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物质富足与精神丰富的合理关系，使人在物欲的享受和精神的富足间实现平衡，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就曾经倡导过一种物质简朴而精神富足的生活，他只身来到瓦尔登湖旁，独自居住，自耕自食，在沉浸自然中去体悟生活，去面对人生最本质的问题。梭罗在沉浸自然的过程中发现了现代工业文明过分重视物质追求而丧失的精神世界，毕竟，从个人层面来看，物质适度富足，精神无限丰富的人生才是健康的，这也是生态文明时代应当具备的价值追求。

## 二、现代性危机的实质

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工业文明发展模式下人类思维方式的危机。人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或者意识形态来理解自然和对待社会，就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工业文明的价值体系及“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已被现代性社会标识为一种强有力的观念及意识形态，这是导致现代性危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现代性的历史与精神运动推动人类获得空前的解放，人类摆脱了外在环境和权威观念的控制，成为了自由的主体，人类主体性的确立催生了现代性对精神的主导。人们已经确信，世界本身不再是上帝及其权威的产物，而是由人类自身理性力量所打造的体系。我们能够对这个体系加以规定，进而拥有自由掌控自己命运及历史进程的力量，事实上基于这种判断，人已经走向上帝继承者的新角色。所以，现代性的这种精神规定一旦形成支配人的思维方式和普遍观念，就会在现实层面发生作用，对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实践观产生相应的影响。

毫无疑问，现代性进程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但现代性精神的错误也严重误导着人类的价值追求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现代性危机的三种表现反映了身居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人类自身的迷误，现代性的深刻危机就植根于人的主体性的过度张扬，而人类主体性的过度彰显是伴随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主客二分”而逐渐加深的。

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认为，心灵与物质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世间万物据此可分为主体和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二元对立观念构成了现代性思维方式的基本架构。在笛卡尔看来，物质的根本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根本属性是思维，人也由肉体与灵魂这两种不同的实体构成，但从本质上来讲，人的实质应当在灵魂而非肉体。从“我思故我在”的普遍原则出发，他确立了人是能够思维的存在物，“我思”因而成了突出人之本质性的规定，“我思”构成了一切知识的开端，任何存在和知识只有通过理性的自我审视，才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知识要以“我思”作为最终的根据。按照这样一种原则，自然世界的秩序和法则也是从“我思”中推导出来的结果。“我思”成了绝对的主体，外部世界是从“我思”中推导出来的秩序而已，因此主体构成了绝对自我，客体则被描述为对于主体“绝对服从”从而丧失独立存在意义的纯粹物的世界。对此，海德格尔指出，“人们根据‘我思’的自我性而规定主体的主体性，‘我’成了别具一格的主体，其他的物都根据‘我’这个主体作为其本身而得到规定，是作为一个与‘主体’相互关系中的它者而存在的，物本身成了‘客体’”（海德格尔，1996），“主体自为地就是主体”（海德格尔，1996）。因此，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来看，作为能思的人成为主体，而一切非人的事物则是客体，自然也就成为相对于人的客体了。

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导致我们在对自然的理解时产生了控制与征服的倾向，对此，加拿大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深刻地指出：“近几个世纪，世界越来越强地被一种强调人和他环境之区分的二元论世界观所统治，这种观点实际上接受了一种原理：人最首要的任务在于逐步建立对所有非人自然的控制”（威廉·莱斯，1993）。人已经将自然看作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的目的和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人成为了相对于自然来说的“主体”，而自然成为了相对于人来说的“客体”。“自然既然成了客体，成了对象，用理智与意志掌控这个对象、改造这个对象以满足人的需求，就势在必行”（张汝伦，2018）。所以，当主体可以认知客体，人类的真正使命便是转变和改造自然而成为她的主人（威廉·莱斯，1993）。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

卫·雷·格里芬也认为“二元论这个概念表达了现代精神和自然世界的关联，机械主义自然观在现代性中得到接受，自然界被认为是毫无知觉的，它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理由。现代精神的中心特征之一即表现为对自然的这种统治、征服、控制和支配的欲望”（大卫·雷·格里芬，1998）。

可以看出，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为改造与征服自然提供了观念与意识形态支撑的理由，致使人类对于自然应有的敬畏感逐渐丧失，助长了人们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渴望和对占有自然效用的迷恋。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固然有鼓励人们认识自然、消除迷信、实现独立自主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思维方式蕴含着毁灭性的力量，从而致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产生冲突，这即是导致现代性危机的根源。

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使得人从万物的尺度成为万物的主宰，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类至少目前已经变得无可置疑的强大，在某种视角下，人成为了比肩上帝的绝对主体。人类越来越难以看到自身在万物之中的微渺，当人的主体性地位被提高至无以复加的高度时，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也急剧扩展。这种绝对化的主体观念将人自身看作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自然的主人，因此居于主导地位，可以随心所欲地驱使、控制自然，因为认为人是唯一的精神主体，而自然仅仅是外在的一个没有生命、缺乏活力、没有灵魂的机器客体，因此被人客体化的自然界便成为了被奴役的对象。

一切自然、社会规律等现象都可以用机械规律来解释。人类对待自然就如同操控机械一般，可以肆意地利用和征服，并通过控制自然的实践活动来行使对自然的统治权利，以满足自身的利益需求。人类在创造丰富物质财富的同时，沉浸于“凡人的幸福”中无法自拔，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危机和人类精神的自我危机。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无疑是人类当代的生存危机。

某种程度上，现代性危机的呈现具有极大的相关性，“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加强了人类控制和征服自然的欲望，助长了人类对自然效用的迷恋。人类在征服和利用自然中进一步满足了自身的利益和欲求，实现了其对享受“凡人的幸福”的物质财富诉求的渴望。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成为现代人类主导自然、社会和自我的行动纲领和原则，导致了社会精神的整体失落和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

### 三、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催生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为现代性危机的化解提供了价值遵循和实现路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构成了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先导，借助于现代性主客二分的思维范式，人类基于主体之形象研判客体之自然，为其征服改造自然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现代性工业文明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张

力推到了极限,生态文明正是针对现代性工业文明的突出弊端而建构的新型文明形态,促使我们从思维方式上进行全面转变,从而引至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生态文明是彻底清算二元分离的机械论世界观和孤立存在论,重建性恢复‘人、生命、自然’共生存的世界”(唐代兴,2018)。基于此种时代诉求,必须建构与生态文明范式相契合的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化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 与自我的冲突,同时变革现代性工业文明中那些不合理的因素,将这种新的精神渗透至社会不同领域,使人们走出 现代性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 精神桎梏。

作为东方文明发源地的古老中国,在其数千年发展的历程中积累了关于自然观念的丰富知识,以遵循农耕文化为主的华夏先民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体现了自觉尊重自然规律的价值观念和 实践特征,他们在自然生产实践中积累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宝贵经验,对于转变当下人类发展模式的思维范式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东西方诸多学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于古代中国,试图从古老东方文明的早期生态智慧中寻找解决生态困境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模式。这个中国传统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解认知的生态智慧,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sup>①</sup>。这些思维方式、生态智慧对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当前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催生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到来。

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华夏先民在长期探求人 与自然关系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构成了传统生态文化、生态智慧的重要内容,这种追求“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不仅是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也是贯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主线。无论是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还是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观点,亦或佛家“众生平等”的普世理想,它们均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将天地万物的“和”与“生”作为自身永恒的价值追求。中国古代这种追求“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与主客二分的机械论思维范式有着本质区别,它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人和自然休戚与共的生态系统普遍处于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自然界是系统的有机整体、而非主体与客体对立的分裂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传统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思想,阐释了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的理念。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论断表明,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6页。



长期发展的产物，自然不仅是人类几千年来生命延续直接的资料来源，也是精神资料再生产的直接来源，更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在于，人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而存在，应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人类能否良好地生存与发展取决于自然生态系统的良好与否，人和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维方式所强调的，是将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同人类社会统一起来，其中蕴含着新时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重要启示。

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变革了人类对待自然的观念，强调的是人类自身价值取向和行动原则的自觉矫正。工业文明视域下的“发展”，是基于对自然无限度索取和掠夺下产生的“文明”特征，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大自然仅仅是我们索取资源的宝库和倾倒废物的垃圾场，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以及对效率效益的无限尊崇是工业文明思维方式的典型发展特征，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发展范式。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必然催生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这是人类文明摆脱发展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般认为，生态文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更为高级形态的人类文明，是文明范式的根本转型。与工业文明以征服和破坏自然生态为代价换取人类文明的巨大发展不同，生态文明是基于对现代性工业文明困境批判反思基础上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绿色文明，它在深入挖掘整合人类传统智慧资源基础上追求更为合理和持续的发展方式，即“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困境，从古代中国‘天人合一、尊天敬德’的生态智慧及思维方式中寻求顺应自然、尊重自然的发展理念”（赵建军、赵若玺，2019）。

现代性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下的发展困境就在于过度地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主体性理解为无往不胜、无所不能的创造性力量，致使人类以自然主人与征服者的绝对主体形象来理解和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全面展现。东方传统生态智慧下的思维方式将人理解为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认为人并未脱离自然单独存在。可以说，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为我们化解现代性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冲突的发展困境提供了解决路径，也成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型摒弃了西方主客二分的价值判断，它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看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进而共同推动自然界和谐有序运作的整体。

总之，思维方式的东方转型，对西方现代性所盛行的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下的认识论和机械论世界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催生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反思，对于人类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认识论重塑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 参考文献

[英] 安东尼·吉登斯（2000）：《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第6页。

[美] 比尔·麦克基本 (2000):《自然的终结》,孙晓春、马树林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第81页。

陈嘉明 (2006):《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4页。

[美] 大卫·雷·格里芬 (1998):《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第5页。

[美] 丹尼尔·贝尔 (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67、第74—75页。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2002):《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78页。

[德] 海德格尔 (1996):《海德格尔选集(下)》,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881—882、第808页。

[美] 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 (2012):《现代性的神学起源》,张卜天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第8—13页。

唐代兴 (2018):《生态文明需要什么样的自然哲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02—109页。

[加] 威廉·莱斯 (1993):《自然的控制》,岳长岭、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第14、第37页。

赵建军、赵若玺 (2019):《农耕文化的伦理价值与绿色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期,第61—65页。

张汝伦 (2018):《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第23—42页。

## Modernity Crisis and the Ris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AO Jian-jun<sup>1</sup>, ZHAO Ruo-xi<sup>2</sup>

(1. Nankai University-Institute of 21st Century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91, China; 2. China National Land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Modernity enters human history as a progressive force that liberates human beings from irrationality and ignorance. While fully affirming the release of human potential, it also causes a variety of crises to highlight. Ecological crisis, human crisis and social crisis ar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crisis. The modern thinking mode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powerful concept and ideology, which is the deep root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The east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rrent mode of think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vide an effective value and practice path for resolving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Key Words:** modernity crisis; mode of thinking;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薛亚玲